

浅析新中国民生建设的两种方法与路径分歧

左 华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制订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考察党内关于这些政策的思考 and 实践,可以看出逐渐明显的两种方法和路径。这些不同的方法和路径相互竞争,相互吸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时至今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科学总结这些不同的方法与路径,汲取历史经验,对顺利推进中国特色民生建设非常必要。

[关 键 词]民生建设;毛泽东;刘少奇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3)02-0139-05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对于民生建设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相互吸收,相互竞争,逐渐呈现出两种分明的方法和路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质又是什么?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会给我们今天民生建设提供诸多启示。

一、民生建设两种方法与路径分歧的历史回顾

1. 共识与分歧

建国伊始,人心思定,百废待兴。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政策。新民主主义政策规定,现在还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处在落后状态,大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P1431)刘少奇也认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适当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但必须是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2](P8)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到天津去指导城乡工作,并明确提出“四面八方”的具体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天津的资本家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不敢放手生产,多数干脆关了厂门、店门,致使天津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上百万人口的吃饭都成了问题。针对资本家的这些顾虑,刘

少奇传达了“四面八方”的方针政策,并说:“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3](P631)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讲话“总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4](P55)

农村土改后,富农问题凸显出来。东北和山西的一些同志担心,很多农民退出互助组,要求单干,一些农民还购进了少量土地或少量雇工,一些共产党员也变成了富农,这样有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不利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主张立即限制富农,把互助组变为合作社。对此,刘少奇认为,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期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行,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5](P90)毛泽东没有支持刘少奇的看法。1951年2月2日颁布的《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指出:“必须继续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的方向。”^[6](P39)而1951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同时肯定了农民的两种积极性,表明关于富农单干问题的讨论及分歧得以消

[收稿日期]2012-11-19

[作者简介]左华(1973-),男,河北邯郸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停。

1952年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经10到15年新民主主义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采取边建设,边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说:“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7](P301-306)刘少奇逐渐接受了毛泽东这一看法,并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8](P143-144)1956年,通过逐步过渡和赎买的办法,我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民生建设提供了新的场景。

2. 行动与挫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利用新政权的优势尽快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一个重大实践课题。1956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和少数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困难,在一些城市和乡村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国际上波兰匈牙利也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毛泽东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刘少奇也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9](P316-328)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0](P383)然而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和整风过程中过激的言论,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刘少奇后来也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这一看法。从此,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受到严重伤害,党内很少再有对领导人的看法提出不

同意见,生怕因此被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等帽子。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使毛泽东认识到:苏联的道路不完全是正确的。他认为,苏联“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存在很多弊端,而我国完全可以靠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各种困难,在短期内使社会主义发展来一个大飞跃。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后赶上和超过英国。^[11](P761)1958年初,毛泽东向“反冒进”开火。他曾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11](P769)并批判了刘少奇修改过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5](P173-174)刘少奇、周恩来等分别在会上作了检讨,并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发动起来,随后又掀起了人民公社的狂澜。

对于“大跃进”出现的“五风”,毛泽东非常关注。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12](P234-235)刘少奇也开始反思,1959年2月16日在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等人的汇报时明确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他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3](P835)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原定议题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但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会议由“纠左”变成了“反右”。高指标在日益高涨的“反右倾”运动中再次一哄而起,进一步加剧了“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信阳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恶性事件。

3. 合作与分争

面对严重的国民经济和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压缩指标,强调综合平衡,反对平均主义,强调遵守价值规律。刘少奇在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同时,致力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调整。

为了将思想统一到中央上来,鼓足干劲,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由县级以上官员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在“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要求客观分析产生缺点的原因,全面评价“三面红旗”的作用。

刘少奇认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他力求稳定发展的大局。同时,刘少奇也集思广益,坦率地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指出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可以根据自己情况作出判断。关于三面红旗,陈云出主意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刘少奇接受了这个建议,对“三面红旗”表现出保留态度。^[13]

会后,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如: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包工包产、开放“自由市场”等。这些措施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很快有了好转。毛泽东对这些调整措施开始是同意的,可是后来他越来越感到这些偏离了“三面红旗”,并试图重回到过去的路子上。这一点在他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责任田的表态上可见一斑。1961年7月,曾希圣向毛泽东说责任田优点大于缺点,毛泽东回答:“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可在12月他就说:“现在生产已经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过来?”^[14](p9-15)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越来越加剧。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放高利贷的。……这些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11](p1238-1242)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一些问题,刘少奇主张“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但“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10](p571)在“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坚持通过教育运动认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打倒资产阶级,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刘少奇要通过运动打击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打击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反对封建主义。

二者的分歧逐渐公开化。在制定“二十三条”

时,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他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15](p116)他认为从现阶段出发,反映基层呼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乃至采用善意的不同意见者的建议,有利于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当时国际上相当紧张,国内干部中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腐败丛生,提起阶级斗争,许多干部和群众热血沸腾。所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主张,一呼百应。方法与路径之争最终演变为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文化大革命”。

二、总结与思考

总结一下这些政策的发展演变,不难看出:

1.改善民生的两种方法与路径之争,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争。

所谓“资本主义路线”是意识形态思维使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其动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这种思想和中国的“大同”思想有很深的渊源,是一种落后国家急于求成的心理所然。刘少奇的个体经济、自由市场等思想也不是为着资本主义,最多可以说成是利用资本。刘少奇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政治保障作用、集体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按劳分配等,无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从刘少奇言论中也不难看出,他对社会主义也有着坚定的信念。他说:“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它好得很,其实是苦得很,它在闹生产过剩,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就要打仗。”^[16]

这些对民生建设看法的不同,可以看成是改良和激进两种观点的不同。毛泽东欲彻底革命,把目标当成过程,强调主观能动性,试图越过生产力的发展准备直接过渡到较高的生产关系,通过政治鼓动、调动群众积极性,取得民生建设的大发

展,总体比较激进。刘少奇工作在第一线,比较现实,强调客观条件,主张在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中逐渐生成社会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新制度,是一条迂回发展之路,大致属改良的方法。

2.激进和改良两种方法互为前提条件,互为吸收,互相促进。

作为改良观点的代表,刘少奇谈的“利用资本主义”,绝不是毫无节制的发展,而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的发展,是为着社会主义,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资本主义。刘少奇主张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自主,自由市场是基于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实现。这些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的框架和目的。更何况,他对大跃进的积极参与和在“四清”运动中形式上的“左”,本身也是激进的。而作为激进观点代表的毛泽东所主张的“大跃进”,也不会是全然不顾现实的跃进,“三年灾害”后的调查研究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是被迫对现实作出的回应。毛泽东也努力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建立在经济核算、按劳分配的基础之上。

激进和改良实际反映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现实的矛盾,二者在实践发展中形成一对张力。毛泽东对未来理想表现出强烈的意志,这种主观的意志不可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刘少奇对现实的驾驭表现出娴熟的技巧,但不能没有宏观的视角和超越。理论和现实终究要一致起来,这就是他们若即若离的原因。

3.从现实层面上讲,两种方法之争反映了落后国家赶超世界的现实困境。

近代中国沉睡在古老文明的温床上,一次次延误了现代化的行程,在日渐被列强侵扰挤压后,被迫奋起直追,赶超现代化。处于自然进程中的原生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因素是依次展开的,而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转型,必然面临内外的强大压力。实现社会整合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这样的国家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社会主义先进制度创立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政治鼓动实现强大的社会动员。但这些革命式的运动必须保

障人权和自由,否则它便偏离了社会主义促进人类解放的本意。解放后,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原始资本匮乏,要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不可能走西方靠侵略积累的道路。我们主要是靠农业积累,靠计划调配打破原来的自然进程,力图短期内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实现新的平衡。这种大规模的急剧转型必然带来积累和消费、计划性和多样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一系列矛盾。激进和改良的方案之争集中反映了赶超先进和落后现实之间的矛盾。

三、历史的启示

1.正视社会主义的现实,切忌意识形态教条化思维。

在党的历史上,一度存在意识形态化、教条化思维的倾向。它往往以“左”或“右”的面目出现,罔顾现实,曾经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左”否认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一味沉迷于生产关系的革命,表现出精神的狂热和臆想。“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事实及其为未来发展提供的广阔空间,不顾中国的条件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二者都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表现。

我国无疑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它是由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帝国主义不允许”等诸多因素发展的结果。^{[17](P679)}对于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曾经这样进行了分析: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际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是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机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实现,渐渐国际化,那是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以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避免绝对的干涉。^{[18](P91-98)}建国之后复杂的国际条件,加上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我们走

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任何探索跳不出这个历史框架,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当然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先进制度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其他文明国家建设的先进经验,努力探寻符合中国特点的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之路。但必须反对凡事就扣个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帽子的教条做法。

2.谨防既得利益者利用方法和路径的争论阻碍历史发展。

两种方法和路径反映了社会上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方法和路径的实践者往往用“正义”、“合理”等口号将人们绑在利益的战车上,而真正获利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将概念绝对化,借以标榜自己代表未来的普遍利益。而真正的民生关切者必须看到“相对性”及广大民众解放的现实的可能性。民生建设两种方法和路径的争论者们,有时片面地攻击对方,同时又相互利用。一些人抓住改革中存在的缺点,试图使人们回到过去;另一些人利用人们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心理,全面否定过去,将其意识形态化,从而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合法化、固定化,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变革。因此,两种方法和路径的争论很难说是广大民众的希望所在。

3.学会用民主的办法处理不同的意见。

可以说,我国民生建设的路径纷争一度演变为残酷的权力斗争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和我国民主体制不够完善有关。民主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相互促进。回顾过去,什么时候民主搞得不好,错误就会较少;什么时候民主搞得遭,错误就会较多甚至很严重。1957反右扩大化,党内外有不同意见者不敢言声,只能对“大跃进”跟进,对“人民公社”跟风。到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党内更无人敢根据实际去纠正错误,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最终造成“三年灾害”的发生。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9](P168)},“要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19](P146)}应该说,领导集团内部和社会上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也是有益的。不同的认识经过民主讨论,可以相互补充,推动事业更健康地发展。尤其是党内重大问题上

出现差异时,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形成共识,有助于避免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如果党内和党外比较民主,一些不同意见能够表达出来并被吸收,政策的制定及贯彻就能做到比较切合实际。而一旦将不同方法与路径绝对化、极端化,使理论偏离实际,就极易被既得利益者利用,从而难以使政策真正汇聚民意,使民生建设效果大打折扣,严重的会导致动乱并可能酿成悲剧。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刘少奇.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 [3]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 [5]鲁彤,等.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 [6]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 [7]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A].毛泽东文集(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9]唐振南,等.刘少奇与毛泽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 [10]刘崇文,等.刘少奇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1]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A].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13]张素华.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4).
- [14]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C].1986(1).
- [15]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16]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2日)[A].转引自,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7]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
- [19]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吴祖鲲